

《致周作人日文書信目錄》之編輯與其學術意義

中里見，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国際文化共生学部門・国際文化学講座

<https://doi.org/10.15017/7410586>

出版情報：言語科学. 61, pp.1-13, 2026-03-14.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致周作人日文書信目錄》之編輯與其學術意義⁽¹⁾

中里見 敬

1. 前言

個人所撰寫的日記與書信，作為了解其思想與行跡的第一手史料，具有高度的信賴性。若其作者為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則該類史料的史學價值尤為顯著。周作人雖以北京大學教授之身份，具備深厚學識，並於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惟因戰時被指控協助日本，被定罪為「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其名譽迄今未能完全恢復。學界對其之評價亦多以政治立場為先，學術研究反而居次。

近年來，周作人之日記與書信陸續得到整理與公開，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新材料，推動周作人研究進入新的階段。本文旨在介紹筆者參與整理的《致周作人日文書信目錄》之編纂過程及其主要內容，期望為今後的研究提供基礎資料與參考。本書的正式書名為《周作人宛日本語書簡目錄（簡易版）附：購書一覽》，然而，為了在本文中使中文讀者更為易於理解，本文擬稱之為《致周作人日文書信目錄》。⁽²⁾

2. 周家書信保存之現狀

關於致周作人之書信歷經中國現代史的動盪波瀾，如何被保存至今，其詳情已由周作人之遺屬詳加說明。

周作人素有保存來信的習慣，但遭損毀、遺失者亦不在少數，目前存於其後人處的書信約 2 萬件（其中日文書信約占十分之一），年代從 1917 年到 1966 年，中文信來信者約 3000 人，日文信來信者約 300 人，來信的機構約 500 家。這些書信也曾在 1966 年開始的「文革」中被劫掠走轉北京魯迅博物館，「文革」後周作人後人發現其下落，於 1988 年追回。收回時這批信件分裝在幾個舊衣箱、紙箱和大抽屜中，有些用麻繩捆紮，大部分散置，散發黴菌氣味。有些書信有封無信、有些有信無封，完整的信函與零散信紙、文稿、通知、票據等混雜無序，一些信紙和信封有蟲蛀、鼠齧、黴變、水浸、蹂躪、撕扯的痕跡，不少信紙上被加蓋了藍色編號印，有的信件加有標籤，上面寫著信件的內容提要以及「已複印」等

⁽¹⁾ 本論文為作者於 2025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參加由臺灣中文學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共同主辦之「2025 破與立：中文研究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所發表之文，今略作修訂而成此稿。

⁽²⁾ 中里見敬、顧偉良、齊藤大紀、杉村安幾子、Susan Daruvala（蘇文瑜）、中野徹、中野知洋編《周作人宛日本語書簡目錄（簡易版）附：購書一覽》，言語文化叢書 24，九州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共 405 頁，2025 年 1 月。

說明，也有些信紙裝在有標籤編號的半透明紙袋內，顯示出這些信件曾經被挑選和甄別。

信件使用的文字除中文外，有日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世界語。⁽³⁾

日本學術界廣泛知曉致周作人的書信的存在，是因為 2015 年 3 月，弘前學院大學的顧偉良教授召開了記者會，日本多家報紙對此進行了報導。顧偉良教授受周家委託，呼籲日本研究者參與書信的整理工作，同時也徵集有關周作人寫給日本人的書信現存狀況的資訊。

顧偉良教授所公佈的《日本各界人士致周作人書信人名名單》中，記載了多達 360 位寄信人，其中包括眾多知名作家與學者⁽⁴⁾。該名單的揭示在日本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撼，成為一則重要新聞。

3. 九州大學參與書信整理之經過

那麼，九州大學為何會參與書信的整理工作呢？事實上，這完全是出於一個極為偶然的幸運契機。此前尚未公開的《周作人日記》中，1939 年的部分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 年第 11 期中首次發表。偶然之中，我注意到其中有如下的重要記載：

下午又整理舊報。得《春水》原稿，擬訂以贈濱君。

此處所提及的「濱君」，即是曾任九州大學教授、專攻中國戲劇的濱一衛。濱一衛於 1934 年至 1936 年間留學北平，並寄宿於周作人府上。他所蒐集的大量中國戲劇資料，在其去世後捐贈予九州大學圖書館，並設立了「濱文庫」。

恰巧筆者當時正參與濱文庫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依據此一線索，筆者對濱文庫所藏文獻進行查檢，最終成功發現了這部極為珍貴的《春水》手稿。經鑑定確認，此手稿為現存謝冰心親筆原稿中最早且完整的一份。詩集《春水》於 1923 年 5 月作為新潮社文藝叢書出版，當時擔任主編並積極推動出版的周作人，一直珍藏該書原稿，並於 1939 年將其作為紀念贈予濱一衛⁽⁵⁾。為紀念手稿的發現，九州大學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日本與中國的謝冰心研究學者與會⁽⁶⁾。周作人後人——周吉宜先生和其女兒周一茗女士亦應邀出席，並首次與濱一衛之女等遺族面對面交流，場面感人至深。

⁽³⁾ 周吉宜、周一茗《關於周作人研究史料：周作人後人保存的部分》，《現代中文學刊》2018 年第 6 期，第 18 頁。

⁽⁴⁾ 顧偉良《日本各界人士致周作人書信人名名單》，現公開於九州大學學術資訊典藏庫（<https://hdl.handle.net/2324/7337128>）。

⁽⁵⁾ 中里見敬《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學：〈春水〉手稿、周作人、濱一衛及其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 年第 6 期。

⁽⁶⁾ 研討會論文集：中里見敬、潘世聖編《『春水』手稿と日中の文學交流：周作人、冰心、濱一衛」國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第 1 冊日本語論文編，第 2 冊中国語論文編，第 3 冊資料編），2018 年。現公開於九州大學學術資訊典藏庫（<https://hdl.handle.net/2324/1912118>）。

在此次研討會上，周吉宜先生和周一茗女士根據謝冰心致周作人的多封書信，發表了探討兩人情感交流的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一段感人的往事：謝冰心在美國留學期間罹患肺結核，身處困境之中，周作人多次致信慰問並幫助冰心發表作品，這些信件成為她精神上的重要支柱。尚存的冰心、吳文藻夫婦之信件，還揭示了鮮為人知的周作人為病中冰心保留教職，甚至幫助批改學生試卷之歷史事實，展示了他們之間曾經之關係。此項研究正是以書信作為史料方得以實現，展現了書信研究在文學與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⁷⁾

4. 書信整理工作的開始至因新冠疫情而中斷

透過此次研討會，筆者得以與周作人之孫——周吉宜先生建立聯繫，並受其委託負責日文書信的整理工作。幸運的是，筆者向日本學術振興會申請的科研經費獲得批准，以「周作人收日文書信之整理、編目製作及保存狀況改善」為題之研究項目自 2018 年 10 月起正式啟動，預計為期六年。2019 年 3 月與 9 月，筆者與其他五位共同研究者兩度前往北京，親眼目睹由周氏家族保存的大量日文書信實物。面對這些歷經歷史巨變與社會動盪而得以保存的史料，我們深感整理工作的責任重大，內心亦為之震撼。

事實上，當我們訪問北京之時，日文書信的初步整理工作已在周家之努力下完成。亦即，所有書信均分別收納於數十個透明資料夾中，每件書信皆被賦予獨立之整理編號，並將寄信人姓名、日期等資訊輸入至 Excel 表格之中。由於周吉宜先生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且為電腦資料處理之專家，故在書信整理所需之數據輸入方面，由具備日文和西文理解能力之研究人員負責採錄並輸入書信數據資料。輸入格式則共同商定如下所示。

編號：保護膜、信件（資料）、內序

原文：收信人、發信人、（日語拼音）、收信地址、發信地址、手寫 / 印章日期、發信局郵戳日期、收信局郵戳日期、全文 / 摘錄

描述：西曆（依據筆跡，參照郵戳）、類別（信紙 / 信封 / 明信片 / 剪報……）、內容概要、涉及人物、書籍、期刊、文章、事件、語種、尺寸（毫米）、信紙種類、書寫工具、縱書或橫書、完好性（殘缺 / 污損 / 蟲蛀 / 霉變……）、郵票、備註

透過 2019 年 3 月與 9 月兩次的整理作業，我們已成功採錄了約兩成的書信資料，順利地展開了本研究。然而，自 2020 年春季起，因新冠疫情於全球蔓延，我們無法再度前往北京，致使本項工作不得不中斷。

⁽⁷⁾ 周吉宜《冰心與我祖父周作人的早期交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 4 期。

5. 作業之重啟至書信目錄之完成

在持續無法前往中國的情況下，我們與周吉宜先生協商後，決定僅以信封之影像資料為基礎，由其提供照片檔案，並輸入寄信人、日期等基本書信資料，以期掌握日文書信之整體面貌。於 2023 年 3 月、9 月及 2024 年 3 月三次作業中，共同研究者於福岡九州大學根據信封影像進行資料輸入。原先所規劃之書信全文輸入及內容摘錄之製作，最終不得不予以放棄。

2024 年春季，周吉宜先生向我方提供了原信封中之書店收據影像資料。周作人曾自日本之丸善書店等處購買日文及西文書籍，並妥善保存其購書收據。此類收據可明確顯示其於何時購買何種書籍，具有高度之學術價值。依據周吉宜先生之委託，我們除整理書信資料外，亦開始進行基於收據之購書記錄整理工作。同年夏季，周家亦提供了保存之名片影像資料，故我方決定將名片資料補充於書信目錄之中。

2024 年 8 月，筆者攜帶簡易版書信目錄及購書一覽原稿，於新冠疫情後首次前往北京，並向周吉宜先生及數位研究者徵求意見，獲得出版許可。由此，《周作人宛日本語書簡目錄（簡易版）附：購書一覽》終於於 2025 年 1 月完成，並以九州大學言語文化研究院專著單刊（Monograph）形式出版。

由於原定之詳細目錄製作計畫未能實現，簡易版目錄所收錄者僅包括寄信人姓名、日期、類別（信封、明信片）、整理編號，並附有人名索引與日期索引。儘管如此，本目錄所涵蓋之寄信人逾千名，書信總數約二千四百件，足以勾勒出與周作人建立交往之日本人士之全貌。茲引用《書簡目錄（簡易版）》之前言，以供諸位研究者參考。

2015 年 3 月，日本各大新聞媒體以及日本廣播公司 NHK 先後報導了有關日本各界人士三百六十餘人致周作人書信的消息。在周作人親屬周吉宜先生的大力配合下，弘前學院大學顧偉良教授發表了其編著的《致信周作人之日本各界人士 360 人名單》（<https://www.hirogaku-u.ac.jp/pdf/list2.pdf>），首次披露周作人後人藏有大量日文書信的事實，在日本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該名單作為周家藏日文書信考察的首個成果，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本目錄編寫的主要目的，在於呈現日本人致周作人書信的全貌，並對前述顧偉良教授的名單進行必要補充。為此，項目團隊於 2019 年 3 月開始實施第一次實地調查。然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跨國跨地域的流動受到限制。2020 年後，前往北京進行的信件調查工作無法繼續進行。當時項目團隊所調查的信件僅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左右。鑑於當時的實際情形，項目團隊不得已對原有研究計劃進行了調整，即放棄有關信件內容部分的調查，縮減為收集整理辨識信件作者姓名、致信日期、信件外在形態等基本信息，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完整地明確並描述日本人致周作人書信的整體樣貌。幸運的是，周吉宜先生從始至終都對本課題項目研究給予了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為項目團隊提供諸種便利，包

括採集信息必需的信封和明信片等電子數據等。

最終，本目錄蒐羅整理並輯錄了來自一千多位寄信人的約 2500 封信件及名片。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名片並不同於書信，但卻是周作人與日本人士交往的重要線索，故一併收錄於本目錄中。此外，亦收錄了若干致周作人夫人周信子（羽太信子）以及長子周豐一的信件。

如上所述，項目團隊實際確認的書簡原件僅有全部書信的百分之二十，其餘大多數信件則依靠電子圖像進行信息採集和確認考察。本目錄謂之簡易版的緣由即在於此。儘管目錄還不完善，但終究涵蓋了幾乎所有與周作人有過交往的日本人，相信它一定會有益於今後周作人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另外，本目錄編者之一的中野徹先生即將出版《周作人的交友圈：周作人書信中的日文書信人名錄》（暫定）一書。有關日文書信寄信人的詳細經歷，可參閱此書。

另一方面，本書所附之「購書一覽」整理並刊載了約九百項日文及西文書籍之購買記錄。雖此僅為周作人藏書之一部分，然亦為觀察其作為現代中國屈指可數之大學者所經歷之知識形成過程之珍貴資料。現茲引用《購書一覽》之前言如下：

在日本各界人士致周作人書信中，包含了許多周作人向日本書店訂購書籍的送貨單。周吉宜先生認為這些送貨單作為購書記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專此委託我們研究團隊成員整理這些送書收據。這次整理的《購書一覽》就是研究成果之一。

具體的處理方式是：按時間順序對送貨單進行排列，記錄送貨單所載具體內容，還推定並補充了周作人所購書籍的版本信息。除實際購買的圖書外，送貨單上還包括因缺貨而實際未得入手的圖書。另外，還有部分書店提供的新書出版消息。總之，《購書一覽》所載書籍包括有部分實際未曾入手者。這些記錄資料呈現了周作人的知識和興趣所至，具有寶貴的學術和文化意義，特予以輯錄。

周作人曾在日記中逐一記錄了他所購入的各種書籍。韓玲姬在其博士論文《周作人における日本文化受容の研究》（筑波大學博士（學術）甲第 6648 號，2013 年）中，曾嘗試通過《周作人日記》對周氏所購書籍進行考察。論文“資料編：資料 1：年次別周作人和書購入目錄一覽表（1912—1934 年）”列出了 1336 冊書籍。此外，子安加余子《周作人・民俗學相關書購讀年表（1912—1934 年）》（《中央大學論集》40，2019 年）也涉及到周作人所購圖書問題。

周運《周作人現存部分外文舊藏目錄》（*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vol 8, issue 1, 2017 年），對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附周作人題記或藏書印章的圖書進行了詳盡調查，計提取周作人舊藏圖書 230 種，含西文書 141 種，日文書 89 種。將購書記錄與

周運論文所載圖書進行比對，可見 57 種西文書及 9 種日文書，共 66 種與《購書一覽》所載書籍一致。由此可見，現存送貨單有可能存在缺欠；除日本書店外，周作人在中國亦有購買外文書之渠道；還有相當數量的書籍系他人贈送；周作人訪問日本時所購書籍也不在少數。總之，《購書一覽》的記錄所反映的僅是周作人外文藏書的一部分，實際的藏書總量理應更多。

我們相信，在《周作人日記》以及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購書一覽》的編輯出版必將有助於進一步明確周作人所購日文書籍及西文書籍的具體形態，並呈現周作人知識形成的動態過程。

中島長文譯注的《周作人讀書雜記》1—5（東洋文庫，平凡社，2018 年）收錄了周作人的諸多讀書札記。這些文章對於理解和把握《購書一覽》所收錄的書籍意義非凡。例如《購書一覽》中出現的書店，在周作人《東京的書店》（收於《周作人讀書雜記》1；初出於《宇宙風》第 26 期，1936 年 10 月 1 日）中便有極其生動的描寫，可與《購書一覽》配套閱讀。

6. 書信目錄編纂後所期待之研究方向

本書信目錄為簡易版本，未來有望完成更為詳盡之版本。特別是若能公開書信之原文或摘要，則該目錄之研究價值將更為提升。然而，公開書信內容之前提，需取得書簡撰寫者之同意。惟多數撰寫者已故，尋找其著作權繼承人（即其後代）並取得聯繫，預期將是一項極為困難之作業。此外，解讀書信內容不僅需具備日語理解能力，亦需能辨識手寫文字。百年前文化人士所撰之書信，多為筆跡工整之作品，然亦有不少難以輕易辨讀者。

在書信寄信人之中，包含多位日本著名作家，如島崎藤村、谷崎潤一郎、志賀直哉、武者小路實篤、里見弴、長與善郎、倉田百三、田村俊子、草野心平等。雖然上述作家多已有全集出版，然其致周作人之書簡並未收錄其中。故此類書信可視為其全集之補遺，具有高度之資料價值。日本作家與周作人間所交換之書信內容，對日本文學研究者而言，亦為一項極具興趣之課題。

周作人與日本學者之間亦有諸多交流。目前已有若干學者之書簡經整理後公開，另有部分書簡預定於未來公開。此類資料對於深入研究周作人及理解日中學術交流之歷程，具有珍貴之史料價值。以下將對書信之公開與整理情況進行說明。

（1）松枝茂夫（1905～1995） 中國文學研究者，曾任東京都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校教授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書信共 116 封，松枝茂夫致周作人書信共 36 封，已由早稻田大學小川利康教授整理並公開，後亦翻譯為中文。松枝茂夫曾翻譯周作人多部著作，另有《紅樓夢》之全譯本。

- 小川利康《周作人・松枝茂夫往來書簡》戰前篇 1—3、戰後篇、補遺，連載於《文化論集》第 30—33、50 號，早稻田商學同友會，2007—2008、2017 年。

- ・趙京華譯《松枝茂夫致周作人函（1936—1965）》，收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1期。

（2）安藤更生（1900～1970） 美術史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

周作人致安藤更生書信共47封，安藤更生致周作人書信共33封，已由日本大學副教授德泉さち女士整理並公開，亦翻譯為中文。

- ・德泉さち《周作人・安藤更生往來書簡》1—3，連載於《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記念博物館研究紀要》第18—20號，2016—2018年。
- ・周吉宜整理，陳力衛、王中忱譯《安藤更生與周作人往復書信》，收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7期。

（3）濱一衛（1909～1984） 中國戲劇研究者，九州大學教授

周作人及其子周豐一致濱一衛書信共7封，濱一衛致周作人・周豐一書信共8封，已由筆者等整理並公開。濱一衛於1934—1936年留學期間，曾寄宿於周作人宅邸。

- ・中里見敬、顧偉良、李麗君《周作人・豐一父子と濱一衛・ふみ夫妻の書簡往来》，收於《言語文化論究》第52號，九州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研究院，2024年。

（4）一戶務（1904～1977） 作家，曾任文部省官員，後任和洋女子大學教授

一戶務致周作人書信5封，已由筆者等整理並公開。

- ・一戶渡、中里見敬、顧偉良《一戶務より周作人宛書簡5通：附〈父・一戶務と周作人先生〉》，收於《言語文化論究》第55號，九州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研究院，2025年。

（5）目加田誠（1904～1994） 中國文學研究者，九州大學、早稻田大學教授

目加田誠致周作人書信5封及名片2張，已由九州大學專門研究員稻森雅子女士整理並公開。

- ・稻森雅子《周家所藏目加田誠致周作人書信等について》，收於《中国文学論集》第54號，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2026年。

（6）吉川幸次郎（1904～1980） 中國文學研究者，京都大學教授

吉川幸次郎致周作人書信4封，現由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金文京先生整理中。若能獲得吉川家之許可，則預定公開。

至於作家與學者以外之日本人寄信人，亦需逐一調查其生平與經歷。關於此一研究方向，曾參與書信目錄共同編纂之近畿大學副教授中野徹，預定出版《周作人的交友圈：周作人書信中所見之日文寄信人名錄》，此一人名錄將成為後續研究之重要基礎。

7. 周作人與中國人士往來書信之整理與研究

周作人與中國人士之間所往返之書信數量龐大，遠超其與日本人士所交換之日文書信，據估計約為2萬封以上。迄今為止，已整理並公開發表者，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 鮑耀明《周作人晚年書信》，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舊版為《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1972年）。
- 李吉如《周曹通信集》（第一、二輯），南天書業公司，1973年。
- 《周作人俞平伯往來書札影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 《江紹原藏近代名人書札》，江小蕙編，中華書局，2006年。
- 《紹興魯迅紀念館館藏文物精品集》，紹興魯迅紀念館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
- 《北京魯迅博物館藏中國近現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8卷 周作人卷》，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

周吉宜氏等周氏家族成員亦致力於以書簡為核心史料，對周作人與個別作家之間之交流進行研究。

相關成果包括：

- 周吉宜《周作人與〈楊柳風〉》，《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3期。
- 周吉宜《冰心與我祖父周作人的早期交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
- 周吉宜、周一茗《周作人與鄭德音》，《現代中文學刊》，2020年第6期。
- 周吉宜、周一茗《周作人與謝冰瑩》，《新文學史料》，2024年第1期。

目前尚存信件約二萬件，其中絕大部分為中文信，來源涵蓋數千位個人及機構。此等書信作為珍貴之原始歷史資料，周氏後人冀望海內外學者協力整理，並最終公諸於世。他們希望透過書簡等史料之整理與研究，促進對周作人人格特質之可信理解與深入認識。

關於周作人著作方面的資料已經比較齊全，但其他方面的資料仍須需蒐集、整理和發表。其中周作人所處環境以及與他交往的人的情況很重要但資料不足，而紮實的史料尤為欠缺。在「人」的研究方面，歷史過程的細節和史料的細節應得到足夠的重視。⁽⁸⁾

8. 《周作人日記》的出版

本研究團隊完成書簡目錄之際，正值一則重要消息傳來，即《周作人日記》全八卷的正式出版。在此之前，日記的公開情況較為有限，其中有1996年由鄭州大象出版社刊行的三卷本影印版《周作人日記：魯迅博物館藏》，收錄時期為1898年至1934年。由於為影印本，若不熟悉周作人的筆跡，閱讀上頗具困難。之後，周作人的日記一直未有完整出版，只有在學術期刊上節選發表，前文所述1939年日記中關於將《春水》手稿寄予濱一衛的記載，即2016年始見於期刊。

此次出版的《周作人日記》，即2025年1月由台灣的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之八卷本，便涵蓋現存所有年代的日記，以排印本形式發行，編排清晰，便於閱讀。此為周作人遺屬歷經多年整理的成果，其內容的可靠性甚高。隨著該八卷本的正式出版，周作人研究可謂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周作人日

⁽⁸⁾ 周吉宜、周一茗《關於周作人研究史料：周作人後人保存的部分》，《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6期，第28頁。

記》年代跨度大，內容和文字複雜，據了解遺屬的校對工作還沒有停止。未來學界有望充分運用此日記進行深入研究，進一步發掘更多關於周作人的歷史事實。⁽⁹⁾

以下將結合書簡整理之脈絡，說明《周作人日記》記載之細緻程度及其學術價值。例如，上文所提一戶務致周作人之書簡，僅記載月日，未標明年份，故需進行繫年作業，以確定其具體時序。

首先簡要介紹一戶務的背景。他早在 1929 年，作為東京帝國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參加了中國視察旅行團，並與長澤規矩也、目加田誠一同拜訪周作人。在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期間，他開始創作小說，並發表於《新思潮》（第 10 次）等文学期刊。一戶務的小說風格屬於現代派，曾獲川端康成、伊藤整等文壇名家的評論與讚賞，反響良好⁽¹⁰⁾。畢業後進入文部省任職，主要從事日中文化交流相關事務，並持續與周作人保持聯繫。

【書簡一】（1940 年）9 月 29 日

此書信內容為，一戶因其翻譯之周作人《苦茶隨筆》由名取書店出版，遂寄送該書予周作人。與此書信相關之《周作人日記》記載如下：

1940 年 10 月 5 日「受信 一戶（中略）一戶務譯《苦茶隨筆》皆寄贈。」

10 月 9 日「上午得一戶寄譯書一冊，有兩處各二頁刪除。託豐二往春明堂買一冊來以贈平白。」

10 月 10 日「發信 一戶。」

10 月 11 日「以一戶譯《隨筆》一冊還贈平白。」⁽¹¹⁾

由上述記載可知，周作人於 10 月 5 日收到來信，稍後於 9 日收到所寄譯書。翌日即回信予一戶，並於 11 日於北京另購一冊譯本，贈予其弟子尤炳圻（字平白）。周作人於其日記中對書信往來之記錄極為詳盡。正因如此，雖然該書信本身未標明具體年代，然透過日記所載之相關記述，得以確定其撰寫時間為 1940 年。

【書簡二】（1941 年）8 月 1 日

此書信之收信記錄未見於《周作人日記》。其內容為請周作人為《近代支那文化讀本》叢書撰寫序文。該叢書於 1942 年至 1943 年間陸續出版，包括《近代支那思想》、《近代支那文化》及《近代支那社會》三冊，惟皆未見周作人所撰之序文。

根據日記記載，周作人於 1941 年 9 月 1 日曾記：「寄一戶信」⁽¹²⁾，可推測其於一個月後回信，並可能婉拒了撰寫序文之請求。

⁽⁹⁾ 參見周吉宜《前言》，《周作人日記》第一冊，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5 年。

⁽¹⁰⁾ 參見一戶渡、中里見敬、顧偉良《一戶務より周作人宛書簡 5 通：附〈父・一戶務と周作人先生〉》，《言語文化論究》第 55 號，九州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研究院，2025 年，58-59 頁。

⁽¹¹⁾ 《周作人日記》第五冊，第 558-561 頁。

⁽¹²⁾ 《周作人日記》第六冊，第 95 頁。

【書簡三】（1942年）2月12日

此一時期，一戶務以文部省官僚之身分，積極參與日中文化交流相關書籍之編輯工作，事務繁忙。該書信內容包括：他自己的著作《支那的發現》已經出版，希冀周作人能予以批評指教；並表示《近代支那文化叢書》及《日本文化讀本》亦將於近日內寄送。《周作人日記》之相關記載如下：

1942年2月20日「受信（中略）一戶」

2月21日「得一戶寄贈書一冊。（中略）一戶務《支那的發現》贈」

2月23日「發信 一戶」⁽¹³⁾

由此可知，周作人於2月20日收到來信，翌日即收到所寄贈之著作，並於2月23日回信。

【書簡四】（1942年）7月15日

此書信除提及寄送《近代支那文化讀本》之一冊《近代支那思想》外，亦向周作人提出撰文請求，內容為：「先生若能撰寫關於日本文化的任何內容，我們將不勝感激。（中略）深知您公務繁忙，冒昧打擾，實感抱歉。但我認為此事意義重大，特此致函，懇請賜教。是否能請您撰寫一篇關於日本文化之美與特點的文章？」（原文為日文）《周作人日記》之相關記載如下：

1942年7月23日「受信 一戶務」

7月24日「得光風館寄書一冊。（中略）光風館《近代支那思想》寄贈」

9月10日「發信 一戶」⁽¹⁴⁾

由此可知，周作人於約一個半月後才回信。雖日記未明言回信內容，然根據時程推測，周作人可能婉拒了撰文之請求。

【書簡五】（1956年）12月26日

此信為一戶務致周作人諸書簡中唯一一封戰後所撰者。1956年10月，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之邀請，第一屆日本作家代表團訪華，並晉見周恩來總理。一戶務亦以代表團成員身分參與訪問，戰後首次抵達北京，並與周作人重逢。《周作人日記》之相關記載如下：

1956年10月14日「紀生同一戶君來訪，以《狂言選》一冊贈之」

11月22日「得對外文化聯絡局轉來谷川十月十日信，一戶同十五日，風呂敷一枚。寄一戶航空信。」⁽¹⁵⁾

據此可知，一戶在方紀生陪同下拜訪周作人，周氏則贈送其於1955年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周啓明譯名出版之《日本狂言選》。然直至一個多月後之11月22日，周作人方由對外文化聯絡局轉得一戶於10月15日所撰之謝函，並即刻以航空信回覆。儘管代表團於10月15日尚在北京停留，然由於通訊受限，一戶致周作人之書信遭當局扣留。此事顯示，周作人實際上處於官方監控之下。

(13) 《周作人日記》第六冊，第159-160頁。

(14) 《周作人日記》第六冊，第217、235頁。

(15) 《周作人日記》第七冊，第483、492頁。

一戶務於 1956 年 10 月 15 日所撰書信已不存。現存之 1956 年 12 月 26 日航空信，係其在收到周作人於 11 月 22 日寄發之回信後所作回應。信中除表達感謝之意外，亦述及其重返中國之所感。一戶信中寫道：“我只是一位貧瘠的中國學者，並非革命家，但看到今日的新中國，我深信這是世界理想之國，並滿懷期待地看著中國日益強盛。”

一戶務於 1929 年首次與周作人相識，爾後歷經戰爭與革命等歷史巨變，直至二十餘年後方得再度重逢，此一相會可謂彌足珍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戶務在戰爭期間曾請求周作人撰寫面向中國讀者、讚揚日本文化之文章；而此次重返中國後，則以新中國為理想之國加以讚美。對此，周作人究竟抱持何種感懷，在試圖揣摩周作人當時之心境時，實不禁感受到其中沉重之情感。

如上所述，《周作人日記》中對書信往來的記錄極為詳盡。此不僅有助於確定書信的具體年代，亦能提供理解書信前後背景之多項重要線索。透過將書信與日記結合運用於研究之中，周作人研究的實證精度有望大幅提升，進而推動相關學術工作邁向更深入的階段。

9. 結語

我們在思考以周作人為代表的現代日本之亞洲留學生群體，以及其所促成的知識傳播現象時，山室信一所提出的「思想連鎖」視角，具有極高的啟發性⁽¹⁶⁾。所謂「思想連鎖」，乃指某種思想或制度跨越地域與社會而得以流播，並進而成為引發社會變革之契機的觀念框架。作為思想連鎖得以運作的回路，山室列舉了「包含翻譯在內之各類印刷物、留學、受聘之外國教師，以及由亞洲各地人士所組織的國際性結社」等多重媒介⁽¹⁷⁾。在此意義上，留學生正是承擔此種思想連鎖之核心行動者。山室著作中記載，截至 1939 年 4 月時，日本各大學與專門學校之中國人畢業生（含在校生）合計達 12,887 名。周作人亦為其中一員。

山室信一在論及周作人時指出，他「厭惡武張氣象的日本，試圖傾聽原應貫通於中國乃至東亞之民族智慧與悲哀之聲」，並且「對於超越時局與政治權力變動的日本文化與民族，擁有一貫的關懷」。在此基礎上，山室進一步論述作為思想連鎖的留學對於個人的意義如下：

留學乃在異文化之地習得知識的行為，在其層面上原本只是一個高度個人性的文化行為而已。然若欲將所學取回之異文化運用於自身成長之文化脈絡之中，則往往可能引發與社會之間不少摩擦。更甚者，若其中再疊加國家或民族之間的紛爭，則在這些衝突的夾縫中被撕扯的，無疑正是承擔兩種文化的個人。⁽¹⁸⁾

周作人与日本知識人之間所往返的書信，正可以視為上述思想連鎖在具體層面上展開的諸多面

(16)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 年。

(17)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第 14 頁。

(18)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第 566-567 頁。

向之一。書籍同樣構成思想連鎖的重要迴路，而周作人的購書記錄，則是這一迴路之具體運作的直接證據。周作人曾直接自東京書店購買日文與英文書籍。關於外地日文書籍流通情況的研究，可舉日比嘉高《帝國的書店》為代表性著作⁽¹⁹⁾。該書揭示了 1945 年以前，在臺灣、朝鮮、滿洲、中國，以及北南美、樺太、南洋等地之日文書籍流通的實際樣態。《致周作人日文書信目錄》的學術意義，若能結合山室信一與日比嘉高的相關著作參照閱讀，當能獲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就周作人研究而言，有論者指出，在考察其人時，不應僅限於與作家、文人之間的交流，亦須將其與政治、行政及軍事領域人物的交往納入視野。《致周作人日文書信目錄》之學術意義，亦可謂繫於此處。伊藤德也在論文中即有如下論述：

周作人在 1930 年代中期所撰寫的文章中，採用「英雄」與「賢哲」的二分法，以此展開其日本文化論。此二者皆為民族文化之代表，但「英雄」指涉政治與軍事方面的代表人物，而「賢哲」則代表文藝與學術領域。（中略）可以說，周作人直至晚年仍與日本的「賢哲」保持心靈上的契合。然而，在其交往的日本人士之中，並非只有「賢哲」，亦包含可歸於「英雄」範疇者，如坂西利八郎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證。若欲全面思考日中文化交流，則有必要將此類人物之交往納入考察，對更廣泛的相關事象加以關注。⁽²⁰⁾

本文最後，擬對本書所收錄之內容進行整理與概述。

所收錄之書信資料起於 1913 年 1 月 13 日，止於 1966 年 5 月 30 日，橫跨 53 年之久。惟其中亦包含大量未詳具年月日之信件。寄信人共計 1017 名，另有若干通寄件者姓名不詳之書信。目錄所列書信總數為 2400 件。若以表格形式呈現各年代之信件數量，其結果如下所列。

年份	數量	年份	數量	年份	數量	年份	數量	年份	數量	年份	數量
1913	3	1921	69	1929	41	1937	23	1945	10	1953	4
1914	2	1922	77	1930	38	1938	14	1946	1	1954	1
1915	1	1923	81	1931	22	1939	24	1947	2	1955	6
1916	4	1924	51	1932	8	1940	82	1948	0	1956	14
1917	6	1925	49	1933	22	1941	92	1949	4	1957	6
1918	16	1926	28	1934	31	1942	70	1950	3	1958	4
1919	4	1927	18	1935	91	1943	71	1951	2	1959	2
1920	44	1928	48	1936	50	1944	36	1952	3	1960	6
										年份不詳	1059
										總數量	2400

(19) 日比嘉高《帝國的書店：書物が編んだ近代日本の知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岩波書店，2025 年。

(20) 伊藤德也《周作人・魯迅をめぐる日中文化交流》，《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 第 5 卷 東アジアの文学・言語空間》東京：岩波書店，2001 年，第 69 頁。

至於購書記錄部分，始於 1913 年 6 月 16 日相模屋書店之納品書，止於 1962 年 1 月 12 日未來社之記錄，歷時共 49 年。然其中 1944 年、1945 年、1957 年及 1962 年各僅存一筆資料，絕大多數記錄集中於 1943 年以前。此外，亦有若干筆記錄未詳具具體年月。購書書店以丸善書店為主，另尚有數家其他書店。所記錄之書名方面，日文書（包括若干漢籍）共計 508 種，西文書則為 446 種。日文書（含漢籍）之著者計 404 名，西文書著者則為 348 名。

附記：在本稿撰寫過程中，承蒙周吉宜先生懇切指教，謹此致謝。

本研究係承日本學術振興會科研費 JP18KK0010、JP21K00328 之補助而成。